照料经济学研究进展*

刘二鹏　张奇林　韩天阔

摘要:由于家庭照料正逐渐演变为一种稀缺性资源,照料经济学从解释如何利用照料这一稀缺资源满足多样化的照料需要出发,对如何创造、选择和分配新的照料资源进行了研究。其围绕着照料服务提供者、政府和照料市场组织等三个主体开展,相应演化为照料行为经济学、照料公共经济学和照料产业经济学分支。照料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所带来的启示是:照料活动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而照料决策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动态过程;政府介入照料活动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可视为一种潜在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投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与要素流动,照料经济产业化发展成为可能。尽管当前国外照料经济发展受到了定价困难、公共政策推行不畅、鲍莫尔"成本病"等因素的制约,但仍能对我国照料经济的研究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照料经济学　照料经济价值　照料公共政策　照料产业

照料活动是构成家庭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性活动,也是实现家庭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以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重要途径。照料是由家庭执行的重要活动之一,但是其重要性体现在为家庭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在执行这项活动。从微观上看,照料活动构成了家庭生存、繁衍、更替的基础,无论是对婴幼儿的照顾培育,还是对年迈老人的侍奉赡养,都体现了作为消费品的照料活动在个体与家庭生存发展中的价值与功能。从宏观上看,社会是由无数个体及其家庭所构成的,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私人照料活动,还是具有公共投资属性的社会化照料活动,都因显著增进了个体的经济福利、人力资本而具有正外部性,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并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与可靠的劳动力。因此,对照料活动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作为学术概念的照料经济学(care economics)又被称为照顾经济学或关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家庭、市场以及政府行为中照料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上述领域中的照料服务如何实现最优化配置以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照料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人们如何利用照料活动这一稀缺资源满足其多种需要,以及如何去创造和分配新的照料资源。伴随着家庭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女性经济学、时间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更加精细化,有关照料服务的话题开始进入经济学视野,相应的公共政策议程逐渐出现。事实上,照料经济学的内涵与概念具有阶段性特征。在照料经济学发展的起始阶段,女性经济学家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忽略女性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批判,以及探讨女性在市场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时间配置,所理解与定义的照料经济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中女性的照料活动是否有经济价值以及采用怎样的方式加以确认、衡量。虽在内涵与外延上未跳出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奠定了照料成为商品以及实现市场化供给的基础。

随着家庭与社会中的照料资源稀缺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出现并引起政府介入照料活动的社会化供给,以及照料生产组织形成、照料活动成为一种职业、照料服务形成商品,照料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开始围

* 刘二鹏、张奇林、韩天阔,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whubest@163.com,qilinzhang@whu.edu.cn,hhtk_95@163.com。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6300009、16JJD84000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9YJA840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绕政府提供照料服务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具体内容，以及照料服务如何实现产业化展开。此时，照料经济具有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照料经济学成为研究照料资源如何最优化配置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现代经济学。再后来，更为激进的观点和定义认为照料经济学是支持和促进人类基本需求满足、人力资本提升与福祉增进的活动总和，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和实践排除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照料与关怀”议题，既忽视了人类生存需求的最基本事实，也不符合后工业经济时期将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做法①。作为一项研究领域，无论是存在于家庭内部还是公共政策中的照料活动，其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已被当今学界所广泛认知。学者们就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照料服务的供给方式、照料公共政策的演变以及照料产业经济的发展等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刻的讨论，初步形成了照料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据此，本文将从照料供给主体、政府以及照料市场组织三个角度对照料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一、照料价值与照料行为经济

有关照料的早期研究集中在家庭内部无酬的、非正式的以及性别化的照顾活动（Becker，1965），以至于幼儿、老年人、残障者等的照顾需求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事情，与公共政策无关。随着工业化、商品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家庭照料活动以及照料服务提供者（通常是女性）的劳动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不仅由于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极大推动，而且由于经济结构变迁、就业形式多元化对女性劳动力的吸纳甚至是需求增加，还在于照料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解放（Folbre & Nelson，2000）。尽管照料服务的供给主体正逐渐从单一的家庭向国家、市场和家庭多方的转变，但理解照料服务的经济价值、照料行为决策（家庭或个体）的形成机制及其性别分工，仍然能够为我们理解照料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提供重要线索。

（一）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及计量方式

1. *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确认*。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以及经济理论中，照料和家庭再生产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被认为是女性的“天然责任”，是家庭内部或女性的私人事务。并且，这一定位也内嵌于社会对“好母亲”的道德准则中。在这种情况下，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其效用更多体现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即实现了家庭与人口的再生产或为其提供了支持（Addabbo et al，2010）。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家庭领域的延伸，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开始出现，该理论试图将“家庭如何通过理性的抉择达到福利最大化”这一理论框架运用到家庭经济生活的分析中，在推动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确认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家庭经济学利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家庭不仅仅是消费单位还是生产单位的原因。通过照料劳动提高被照料者（孩子、老人等）的福利是家庭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家庭成员以及人类自身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Becker，1965）。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尝试构建了一个“家庭生产模型”（也称家庭时间配置模型）。该模型假定一个家庭仅由丈夫和妻子组成，夫妻双方的行为都是利他的，丈夫在市场上的效率及工资水平高于妻子，而在家庭领域的生产效率低于妻子。家庭生产商品总量可以表示为个体照料服务与市场劳动时间投入的函数。在此模型中，为了达到时间资源的最优配置，丈夫需要权衡市场工作时间的边际产出和家庭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而妻子会把全部时间分配到家庭，因为其在家庭部门的边际产出大于其在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出，家务劳动的专业化以及家庭内商品的交换会让妻子在家庭生产方面更富有效率②。因此，妻子比丈夫投入更多

①理安·艾斯勒在《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2008）一书中提到，在日益增多的个人、家庭、社会等问题背后藏着一个共同的决定性要素——缺乏关怀，现存的经济模式奇怪地忽视了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事实：首先是关怀和给予关怀对所有经济活动的极大重要性。除非更加重视关怀和给予关怀，指望非关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发生变化是不现实的。在本书中，她倡导建立使人类需求和能力得到培育、关注“高质量人力资本”所需关怀并给予关怀的经济模式。

②贝克尔的新古典一元家庭模型存在明显的瑕疵，现实情况中，不同家庭成员具有不同的个人效用函数，这与该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左。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非一致同意模型（Manser & Brown，1980）和集体模型（Browning et al，1994）。当然，也有学者对上述两个模型的适用性从情感与道德的角度提出了批判（Kabber，2001）。

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家庭照料劳动更为划算(贝克尔,2005)。

尽管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并未直接指出女性在家庭生产中所提供照料的经济价值,但仍然可以依据以下两点对照料的经济价值做出推断:其一,个体的时间和人力资本都是稀缺性资源,当妻子将这些资源投入到家庭部门时,必然会失去将它们投入到市场部门的机会及收益。其二,家庭内由妻子所提供的照料活动为其他家庭成员(丈夫、未退休的父母、成长的儿童等)的劳动生产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照料活动有典型的使用价值、市场交换价值以及可供持续消费剩余价值的属性,本质上属于非商品交换的劳动,不能因为家庭照料未进入市场的定价或交换环节而否认其经济价值。

2. 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计量。在家庭中由妻子所提供的照料服务虽然没有在市场上进行定价或出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服务没有价值。无论是在当前争议较大的家务劳动是否具有国民经济价值、是否应该被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在婚姻家庭破裂后作为家庭照料主要提供者的妻子所提出的经济补偿是否合理、乃至于怎么补偿等,合理计量照料活动的经济价值都十分有必要。目前学界关于照料活动经济价值的计量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替代商品法(proxy good method)。该方法也称为市场成本替代法,认为确定家庭照料经济价值的主要方法是为家庭照料在市场中找到与之相近或可以替代的商品来衡量其经济价值,即如果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照料服务需要花费多少钱。一般而言,替代商品法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替代法",该方法假定各种照料服务是由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员分别提供,利用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分别作为不同照料劳动的替代成本,乘以各项照料劳动的时间然后加总(Van Den Berg et al,2006)。另一种是"综合替代法",该方法假定全部照料服务由一位专业服务人员提供,用该人员的平均工资率来替代全部照料服务的工资率,并乘以其劳动时间,得到家庭无酬照料的经济价值(Patel et al,2004)。基于上述测算方法,Arno et al(1999)通过测算美国 1997 年家庭照料者数量、周平均照料时间以及工资率,得出 1997 年美国家庭照料的经济价值约为 1960 亿美元。而到 2007 年和 2011 年,美国由家庭所提供的照料经济价值已分别达到 3750 亿美元和 4700 亿美元(Feinberg et al,2011)。

但客观而言,替代商品法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专业照料服务与家庭无酬照料服务在生产率上不是线性对等关系,对于不同的照料服务而言,专业服务人员的照料生产率可能会低于或者高于家庭照料提供者,这就会导致家庭无酬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被高估或者低估。其次,替代价值或照料替代服务的价格应该选择政府所提供的照料服务的价格作为参考,还是选择市场部门提供的照料服务的价格作为参考?由于二者的差异较大,势必会带来估计的偏差。再次,"综合替代法"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部分无酬照料是家政服务市场无法也不能提供的,那么该部分无酬照料的市场价值就缺乏参照标准。最后,由于照料服务市场中女性劳动力居多,其工资水平本就存在一定的歧视现象,这也会导致家庭无酬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会被低估。

(2)机会成本法(opportunity costs method)。该方法是用家庭照料者因选择从事家庭照料而放弃获得其他经济收入(或潜在收入)的方式来衡量家庭照料经济价值。其前提假设有二:其一,时间利用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其二,无偿劳动与有偿劳动能够完全替代。在该种计量方式下,照料的货币价值等于照料者从事市场劳动的工资率乘以花费在家庭照料上的时间(Posnett & Jan,1996)。Carmichael & Charles(2003)基于英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承担照料任务的女性相比于没有承担照料任务的女性工资水平将会下降 4~10 个百分点。而对于每周照料时间超过 10 个小时的女性而言,工资水平将会比同等条件的男性下降 18 个百分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于刚刚承担起家庭照料责任而缺乏照料技能和经验的女性而言,家庭照料将会导致其年工资水平下降 750 美元(Wakabayashi & Donato,2005)。Dong(2015)基于 2008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Time Use Survey)研究发现,女性每周投入在无酬照料中的时间平均为 27.3 小时,利用机会成本法测得无偿照料的全部价值达到 1.8 万亿元,约占当年 GDP 的 5.9%。

"机会成本法"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第一点主要体现在不同个体的时间成本不同。例

如，普通工人与律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水平差异较大，但按照机会成本方法，依据其所提供家庭无酬照料的时间乘以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所得到的无酬照料价值则差别非常大。当然，为了克服这一缺点，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地区平均工资来替代差异较大的个体工资（Budlender，2008）。但客观而言，任何使用市场工资来估计家庭无酬照料价值的前提假设是：家庭照料活动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与其性质相同并具有可比性的市场服务。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样无形中会导致无酬照料劳动的价值被错误估计。第二点在于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个体期望工资水平是无法获得的。尽管有研究提出可以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先估计参与市场劳动群体的总体工资函数，再使用总体工资函数的参数值估算那些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群体的预期工资水平。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不参与劳动力市场个体的无酬劳动的机会成本不是市场预期工资而是保留工资，这些人不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原因在于她们的保留工资比预期市场工资高（Sousa-Poza et al，2001）。第三点在于机会成本法仅仅测量了家庭照料者放弃工作或减少劳动时间所暗含的经济损失，而未衡量因照料所放弃的闲暇的经济价值。依据“工作—非市场时间”模型（market work－non-market time model），应该进一步将非市场时间细分为闲暇和家务劳动（Aguiar & Hurst，2007），但确定闲暇部分经济价值也存在不小的难度。

（3）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条件价值法是通过调查得到被照料者对照料服务的支付意愿（WTP，willingness to pay），或者照料提供者对照料服务的补偿诉求（WTA，willingness to accept）来测算家庭照料经济价值的方式。具体地，该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询问家庭照料者提供额外一定量的（通常是一小时）照料所需要的最低补偿，或者被照料者少接受一定量的照料服务所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钱数来测量非正式照料的经济价值。Van Den Berg et al（2005）基于荷兰的调查数据显示，照料者每提供额外一小时的照料服务所需要的最低补偿诉求在 7.2～9.72 欧元左右。而 Gustavsson et al（2010）对阿尔兹海默病患照料者的研究发现，如果每天减少 1 小时的必要照料时间，他们每月愿意支付的金额数在美国、西班牙、英国和瑞典分别为 144、121、105 和 59 英镑。

同样，用条件价值法估计非正式照料的经济价值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在照料补偿方面，家庭照料包含了感情、义务和爱的考量，在此情况下，家庭照料者很难就额外照料补偿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补充需求，或者根本不愿意提出补偿的诉求（Van Den Berg et al，2005）。其次，无论是补偿的诉求还是额外照料的支付意愿都属于一种假设，其真实情况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最后，由于个体的异质性，不同个体对于条件价值法的认知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条件价值法对照料服务的支付意愿的测量可能存在不准确的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可能无法表达其支付意愿，难以了解其真实的照料需求。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比较典型的方法之外，学界对于家庭非正式照料经济价值的计量也设计出了其他方法，如联合测量法（conjoint measurement method）、健康效应价值法（valuation of health effects）、福利价值法（well-being valuation method）以及主观或客观负担测量法（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burden）等方法（参见 Vernooij-Dassen et al，1996；Brouwer et al，2005），这些方法同样存在可取之处以及缺点。

（二）照料决策的微观经济基础

照料方式可分为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照料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同，前者是指来自企业、政府、社会团体等正式组织所提供的货币化、专业化的照料服务；而后者主要是指来自家庭、亲属等个体的非专业化服务，在供给时间、质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对被照料者提供何种方式的照料服务均受到家庭决策、市场化的照料服务发展状况的影响。

1. *家庭决策理论及在照料决策中的应用*。家庭决策理论在将扩展的家庭效用函数、家庭内部成员行为的异质性以及家庭行为的生命周期性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的过程中走向深入和成熟。从只考虑一位决策者偏好的“单一模型”（unitary model），到假设所有家庭成员的偏好一致和具备可合并性的“集体模型”（collective model），再到考虑家庭成员效用与决策异质性的“家庭联合决策模型”

(joint decision model),以及后来的细分家庭及其成员生命周期的“家庭生命周期决策模型”(family life-cycle decision model),家庭内部照料服务的供给始终受制于“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家庭决策,也即家庭是在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约束下做出关于照料服务的供给决策(Apps & Rees,1997)。这是因为,无论是使用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和人力资本生产出家庭所需的照料服务,还是使用货币去购买专业化的照料服务,本质上都是对家庭资源的一种分配与消耗。

在一项对家庭老年人照料服务供给决策的研究中,Van Houtven & Norton(2004)通过对“健康需求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了一个包含具有自利倾向的父母和利他行为的子女所组成的非合作博弈的家庭静态模型。在该模型中,制约子女非正式照料行为选择的因素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因素构成了静态比较过程的照料效用函数,子女照料服务的供给选择、自身收入水平及其自身健康状况是老年人照料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决定性条件。Bolin et al(2007)对欧洲 10 国的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居住方式以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都会对家庭照料决策产生影响,家庭对于非正式照料与正式照料的选择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动态过程。家庭照料时间每增加 10%,将会导致老年人使用正式照料的概率下降 0.6%,家庭的非正式照料与市场的正式照料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替代关系。

2. *照料决策中的代际经济关系*。从家庭集体决策中代际互动的角度看,照料服务所具有的成本将会引致家庭照料决策与照料模式发生变化。有研究指出,家庭规模缩小、普遍就业模式加剧了家庭照料服务在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短缺”(Lewis et al,2008)。在家庭照料决策中,受制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约束,子女可能会选择减少对父母的照料供给而增加对父母的经济赠予,以使其能购买到市场化的照料服务,而自己也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Liu et al,2017)。由于多数老人仍旧倾向于接受来自子女和家庭的照料,如何促使家庭尤其是子女提供稳定可靠的照料服务是老年人参与家庭决策时的重要考量。

一些学者提出了家庭照料决策中的“策略性财产遗赠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该理论认为老年人的实际照料需求往往与子女所愿意提供的照料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老年人会通过对自身金钱、房屋、有价证券等资源的支配来影响子女的照料供给行为(Perozek,1998)。同时,从家庭成员之间效用与决策异质性的角度考虑,家庭照料服务的供给还取决于照料需求方在家庭决策中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因素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家庭理论在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方面的缺陷。如果老年人在家中经济地位越高、可支配的资源越多,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议价能力就越强,所能得到的由子女或家庭提供的照料服务就越多(Pezzin et al,2009)。

3. *经济因素在阐释照料决策中的局限性*。必须要承认的是,并非所有的家庭照料活动都能够在市场中找到替代品,也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愿意这样做。例如有研究表明,母亲在儿童早期(3 岁及以下)的成长发育和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父母是孩子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社会化老师,构成了后来的同伴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家庭给婴幼儿所提供的亲密、周全与充满爱的照料是任何社会机构和其他照料者所不能替代的(Saraceno,2011)。这一观点强调与巩固了家庭与母亲照料在儿童的抚养照顾以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尽管婴幼儿照料社会服务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但当母亲的需求和孩子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她们往往会牺牲自己的需求。比如,多数母亲仍承受着失业、降职、降薪等的压力来照料婴幼儿以确保其得到最好的照料服务(Gash,2009)。来自 OECD 国家的数据显示,拥有 3 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就业率普遍低于拥有其他年龄段孩子的母亲,低出的水平大约在 13%~20%左右(OECD,2014)。

(三)照料活动的性别分工

1. *照料活动性别化的表现*。照料活动历来都是一件非常性别化的实践,无论是在性别意识迷蒙的过去,抑或是社会性别区隔不断缩小的现在,女性都是照料活动的主要实践者。甚至近来的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公私领域的分离以及照料向家庭领域的回归,作为成年夫妻家务劳动重要补充的儿童家庭劳务活动也呈现出性别化的分工,女童比男童在家务劳动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Hu,2018)。通过在家庭分析中引入“剥削和阶级”的概念,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分析了家庭领域中

剩余价值的创造、占有和剥削情况。他认为，通常情况下家庭领域的剥削并未被清晰地认知以及成为一个社会概念，事实上它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家庭之中。比如，相对于单身母亲而言，有配偶或生活在完整家庭结构中的母亲，需要创造出更多的家庭剩余价值才能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其中的主要方面就包括丈夫对妻子剩余劳动的消费占有，因为妻子不单单是承担了她应尽的义务，而且为家庭成员的共同生存与生活付出了更多体力和精神努力。

尽管工业社会以来，资本、劳工政策以及福利体制所塑造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正在被女权主义运动、女性就业率和收入增加等因素所逐渐消解，但在家庭照料分工这一领域内，照顾责任女性化的事实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在福利水平很高的国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不及女性的 1/2（Sullivan et al，2018）。并且相当一部分学者指出，女性的劳作模式从过去单一的“家庭劳动”转变为“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兼顾的模式（Fahlén，2016）。来自 OECD 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在照料家庭成员活动中每周投入的平均时间为 4 小时 47 分钟，而男性所投入的平均时间仅为 2 小时左右。就其 26 个成员国而言，韩国每周在家庭照料中投入时间的性别差异最大（女性为 5 小时 36 分钟，而男性为 1 小时 10 分钟），且所有成员国男性每天所投入的家庭照料时间均远低于女性①。

2. *照料活动性别化的理论解释*。如何理解家庭照料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差异？已有研究从“性别意识理论”“相对资源理论”“时间可及性理论”等角度进行了解释，并从实证角度进行了验证。其中，“性别意识理论”也被称为“性别认同理论”或“性别角色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中家务劳动的分配是依照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性别实践中对男女性别角色的期待，以及夫妻双方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与接受的性别价值观进行的（Bertrand，2015）。比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男女性别实践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规范中“男性气质”体现为从工作中争取更多的家庭经济资源，“女性气质”体现为操持家务与育幼扶老等照料活动。而“相对资源理论”假定家务劳动是缺乏直接回报且烦琐、无趣的，夫妻双方对家务劳动均持一种回避的态度，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基于夫妻双方相对资源的多寡及在此基础上博弈的结果（Baxter & Hewitt，2013）。很显然，夫妻双方谁去从事家务照料劳动取决于其拥有相对资源的多寡、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拥有议价能力的高低。在这一点上，女性所拥有的相对经济资源及议价能力明显低于男性（Aassve et al，2014）。“时间可及性理论”则认为家庭照料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时间可用性而进行的理性分配，其假定家庭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必须考虑家庭成员的比较优势和时间配置的专业化。由于男性较女性在市场部门更有效率而女性较男性在家庭部门更擅长，最大化家庭收益的安排即是男性把时间全部或更多地投入到市场中，而女性把时间更多地分配在家庭的再生产中（Burda et al，2013）。

但需要明确的是，上述任一理论视角在解释家庭照料实践性别差异中都存在其合理性与局限性。比如，“性别意识理论”无法解释在性别差距更小、性别意识更加平等的情况下女性家庭照料时间仍远高于男性的事实；而面对女性工资水平、教育程度高于男性但仍会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主要家庭照料活动的事实，“相对资源理论”和“时间可及性理论”的确也陷入“失灵”。这充分表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对家庭照料实践的性别化差异进行完全阐释，也无法排斥和否定其他理论在解释家庭照料实践方面的合理性。这决定了照料实践性别差异的正确诠释需要更加综合与全面的理论视角。

二、政府与照料公共经济

随着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动、女性教育水平与就业率的提升以及照料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诉求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照料供给多方主体的框架分析照料资源在各部门间的互动关系。至此，照料不再单单被认为是女性抑或是家庭的责任，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也应成为照料服务的责任主体，尤其是，将照料纳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和具体的政策设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①数据来源于 OECD 国家家庭数据库：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database.htm。

(一)政府介入照料供给的必要性

随着家庭照料功能的下降和家庭照料赤字的日益显现,西方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必须对家庭照料行为进行介入,否则将会侵蚀整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一系列研究从"照料活动公共物品属性和正外部性""家庭功能失灵""性别平等"等不同视角解释了政府介入照料服务供给的必要性。

1. *照料活动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正外部性*。界定照料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其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可能是决定政府介入照料服务供给的最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市场往往会在公共物品以及具有正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提供上陷入失灵。以儿童照料为例,儿童的公共物品属性已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认可。儿童不仅是可为父母提供劳务、情感和经济支持的私人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也是能被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公共产品(Folbre,1994;Steurer,2009)。Folbre(1994)认为儿童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常明显,儿童是社会潜在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口,养育儿童的父母并不能排除其他未养育子女的父母享受这些社会成果,包括成长为劳动力后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待遇等。所有老人都会享受到成长为劳动力的儿童所提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的父母都会在未来的劳动力和纳税者——儿童的成长中花费精力。这间接表明对儿童照料的家庭回报率往往低于社会回报率,因此,家庭对儿童照料的投入会低于最优的社会投入(Heckman & Carneiro,2003)。

正外部性是指某种物品或行为使他人受益却没有相应的成本补偿的现象。一般而言,存在外部性的地方,市场机制通常会陷入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与社会福利不能够达到最优化。而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或服务,其提供量往往会少于社会的需求量,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政府介入照料服务供给显然也具有正的外部性,对儿童而言,促进其健康发育和成长,可视为对未来劳动力的投资,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而言更是如此(Lefebvre & Merrigan,2008),这会产生类似于公共教育一样的正外部性。对于女性而言,可以促进其工作的连续性,提高其经济独立性并降低因婚姻变故、年龄增长等对其经济状况的冲击。对于家庭而言,政府分担家庭照料责任能够降低家庭的育儿成本,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Guest & Parr,2013)。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看,政府对老年人照料的介入会降低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放松当前的消费和投资约束,进而有利于当前经济增长(Vere,2001)。当然,政府介入老年照料也可以视为对家庭照料功能的补充或替代,因此对于消除老年人的照料贫困有很好的作用。以上种种理论均体现了作为"社会投资"属性的政府公共照料服务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 *家庭功能失灵*。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在一定意义上,家庭功能是否正常发挥直接决定了家庭成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哺育与赡养是家庭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保障了家庭和社会的繁衍继替。从家庭功能的角度看,二战以后,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女性就业率上升等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婚姻稳定性降低、人口流动频繁等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下,家庭的照料功能受到严峻的挑战,家庭不宜也不能够为其"依赖型成员"提供全部的照料服务(Thévenon,2011)。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先于市场介入到家庭照料功能的完善中去,通过就业支持、服务供给、现金补贴、带薪休假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来增强或者替代家庭的照料功能(Bettio & Plantenga,2004)。

造成照料家庭功能失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工业化及其所衍生出的工业资本主义逻辑。首先,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生育率并型塑了核心化的家庭结构,这直接削弱了家庭照料功能发挥的人力资本基础(Galor & Weil,1996)。而且,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低生育率有较强的"自我强化效应",一个国家(地区)一旦陷入"低生育陷阱"(low fertility trap)①就很难摆脱出来(Lutz,2006)。其次,工业化进程对女性就业的吸纳弱化了家庭原有的照料安排。二战以后,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发达国

①"低生育陷阱"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育龄妇女(16~49岁)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的情况。

家男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在逐步缩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显著改善了其就业状况，甚至在男性就业率波动下降的趋势下，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稳定提升（Gash，2009）。然而，女性就业率的提升在给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改善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工作—家庭”冲突、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弊端，这直接阻碍了家庭照料功能的实现（Kögel，2004）。

最后，照料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替代与弥补了家庭照料功能的缺失。Bolin et al（2007）认为，家庭照料功能与市场化、产业化的照料服务通常呈现出一种互补或替代的关系。照料服务产业化发展既是家庭照料功能下降的原因，也是家庭照料功能下降的结果。一方面，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组织忠诚度、工作投入以及连续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和竞争意识更加明显，工作任务与家庭照料之间的时间冲突、压力冲突和行为冲突难以调和，家庭照料功能下降成为必然（Kimmel & Connelly，2007）。另一方面，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作为对家庭照料功能下降的回应以及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举措，照料服务产业化发展有了更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Dwyer，2013）。

3. 性别平等促进。实现性别间的平等历来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两性在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和政治赋权等诸多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助推性别平等的动力存在阶段性效果并在当前呈现出疲软、逆转的态势（World Economic Forum，2017）。Folbre & Himmelweit（2010）研究指出，持续探索促进性别平等的动力机制和政策工具，并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各种政策议程，成为各国缩小性别差距的关键。从性别差距的发展历程看，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是引致社会领域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基础（Yoon，2014）。因此，诸多性别促进政策的起点多是从家庭领域开始建构的。

事实上，无论是女权主义者的呼吁，还是女性生活中所客观存在的“工作—家庭”冲突、夫妻家庭地位失衡以及婚姻稳定性下降等现实情况，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供给对于促进男女性平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Lewis（2001）指出，工业化早期所形成的“男性养家、女性持家”模式已经伴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转变、女性就业提升而弱化，性别平等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使女性受益的狭隘取向，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构成了主动适应经济转型以及融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机制。然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而深刻的参与实际上是增加了女性的负担，对男女平等的促进作用并不大。这是因为家庭内部照料活动的性别分工滞后于劳动力市场领域的动态变化。女性的责任从过去“主内”的一肩挑模式向当前“内外兼顾”双肩扛模式转变。如果政府所出台的公共政策不能扭转女性占主导的家庭内部照料分工模式，那么其他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Lewis，2001；Fahlén，2016）。

（二）照料公共政策的供给内容

照料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水平、福利观念、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照料公共政策的内容及其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北欧国家（如瑞典、挪威等）更强调通过“亲职假”（parental leave）和“照料公共服务”来完善与增强照料公共政策的效果。而以保守主义模式著称的德国、法国等的照料公共政策基础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因而其照料公共政策的着力点放在“经济补贴”上。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英国等强调照料工作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家庭，因而其照料公共政策无论是在经济补贴还是服务支持方面的水平都比较低。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照料公共政策的发展，其主要内容集中在“时间政策”“照料服务”“经济支持”三个方面。

1. 时间政策。照料公共政策中时间政策的重点是“亲职假”，即通过向工作群体提供带薪或不带薪假期，使工作群体能在不失去现有工作岗位的前提下为家庭成员（婴幼儿、老人等）提供照料，除此之外还有弹性工作时间、时间购买计划、远程办公等措施。照料假期政策的最初对象是针对儿童设计的，主要有女性产假、父亲假和父母假，目的是为了保障儿童福利和生育率稳定。伴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深，一些国家、企业和组织针对老年照料中子女缺位的现状，出台了子女照料父母假期

的措施,如子女护理假、带薪陪护假等(WHO,2015)。儿童照料时间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施行得益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力倡议和推动。针对世界各国儿童早期照料中父母作用下降的事实,国际劳工组织在1919年通过了《生育保护公约》(No. 3),并在1952年(No. 103)和2000年(No. 183)进行了修订①。1919年的第3号公约倡议给予受雇于工商业部门的女性职工12周的产假(产前产后各6周),并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1952年的103号公约倡导给予所有女职工产假,并建议把产假延长到14周(产前6周,产后8周),且享受全额工资待遇。2000年的183号公约进一步明确了产假期间现金津贴的数额不得低于原先收入或是为计算津贴而加以考虑收入的2/3。

为了进一步鼓励男性尽早进入抚育婴幼儿的家庭角色以力求实现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并减轻新生儿母亲的照料负担,20世纪7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典、法国和挪威)开始推行针对夫妻双方的"父母假",进而确认和强调了父亲在儿童照料中的责任。这一做法最终得到了欧盟的认可,并于1996年推行了一项父母假政策,即所有雇员都可以获得至少3个月的不带薪休假。为了推动职场中的男性申请该假期并参与到儿童早期照料中,芬兰、瑞典、丹麦进一步出台了"父亲配额"的规定,即父母假中的一部分时间是专属于父亲的,父亲不使用该假期将会失效。英国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后一个推行父母假的国家,其规定新生儿的父母能休13个星期的不带薪父母假(Moss & Deven,2006)。

2. 公共照料服务。公共照料服务是指政府通过提供公共照顾设施、制度化与专业化的照料服务来满足社会成员或家庭对照料服务的需求。多数学者指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照料服务显然具有先进性、现代性等优势,能够从更加精细化的角度补充和完善家庭照料功能、增进个体潜能以及振兴劳动力市场(Lundqvist & Roman,2008)。政府提供公共照料服务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构成了经济社会转型重要推动力。当然,应当看到的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体制中,公共照料服务的功能侧重有所不同,大致上有"维持基本需求""补充家庭照料不足"和"扩展被照料者可行能力"三种模式。具体地,当前政府所提供公共照料服务主要针对儿童、老人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及其照料提供者。其中,为儿童和老人提供照料成为多数国家照料政策的主要内容。针对儿童的公共照料服务主要有公共日托服务、早期教育服务、保健服务等,针对老年人的公共照料服务主要有上门照料、日间照护、助餐服务、康复拓展等。当然,随着照料公共服务的发展,照料公共服务的政策对象也转向了照料提供者,如针对照料提供者的技能培训、压力与情绪疏导、喘息服务等(Molina,2015)。

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公共照料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从重视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照料服务供给,到将照料视作整个社会的"(准)公共物品"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透视出西方国家福利政策从补缺型、普惠型再到发展型的社会投资理念的基本面向。尤其是,在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照料责任公共化之后,投资于儿童以促进未来人力资本建设的儿童照料服务正在蓬勃兴起,这一举措保证了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双重效益(Jenson & Saint-Martin,2006)。数据显示,当前大多数OECD国家在儿童早期教育和养护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左右,丹麦、瑞典和冰岛等国家的这一支出更是超过了GDP的2%(OECD,2016)。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因而,无论是家庭还是政府,投资于儿童照料以确保其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早期发育、社会适应等,都是在为社会储蓄优质的人力资本,可视作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提前投资。然而,也正是照料儿童所存在的正外部性使得政府介入并提供优质的儿童照料成为必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持儿童这一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Folbre,1994)。因此,儿童社会政策改革构成了近年来欧洲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内容。

3. 经济支持。相对于更加复杂和精细化的服务设计,经济支持是政府介入照料领域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在照料服务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为家庭照料提供经济支持既可以扩展家庭在照料选择中的可行能力,又可以繁荣照料服务市场发展。从经济支持的对象上看,在儿童照料经济

①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官网:https://www.ilo.org。

支持方面，有儿童津贴、多子女奖金、家庭津贴、税收减免、儿童储蓄账户等；在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和残疾老人照料经济支持方面，有居家护理补贴、照料服务代金券、子女照料津贴及入住政府运营的照料机构等。在上述补贴项目中，儿童津贴、多子女奖金、居家护理补贴的发放对象分别是儿童和老人，是对需要被照料的儿童和老人照料成本的直接补贴。家庭津贴、税收减免、儿童储蓄账户、子女照料津贴、照料服务代金券及入住政府出资运营的照料机构则是针对“照料提供者”的补偿，属于间接补贴。

在直接补贴方面，英国针对家庭第一个孩子的儿童津贴标准从 1992 年的每周 9.65 英镑上升到 2015 年的每周 20.70 英镑，之后的每个孩子为每周 13.7 英镑。至少可以领到 16 周岁，之后视情况可能继续发放到 18 岁甚至 20 岁（HM Revenue & Customs，2015）。加拿大则形成了以儿童税收津贴和全国儿童津贴为核心的儿童照料体系，前者以税收抵免的形式向家庭提供儿童照料津贴，到 2012 年该项税收抵免为 18 岁以下的每个孩子减少的税金高达 329 加元。全国儿童津贴则直接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每个孩子提供不同力度的补贴，家庭每年净收入低于 3 万加元的家庭将获得儿童津贴的全额，拥有 6 岁以下的儿童的家庭每年将获得 6400 加元津贴，拥有 6～18 岁儿童的家庭每年将获得 5400 加元津贴（Canada Revenue Agency，2018）。在间接补贴方面，以美国在 2000 年出台的家庭照料者支持项目（NFSCP，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 Support Plan）为例，该项目由联邦老龄署向州和地方老龄署拨款，旨在支持和鼓励家庭照料者为老人提供照料服务，2009 年联邦政府对该项目投入的经费达到 1.53 亿美元（Barber，2013）。类似的照料者支持计划还有诸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寄宿服务项目”、日本的“黄金计划”等。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直接补贴还是间接补贴，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对照料活动所进行的干预，最大程度体现了照料工作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暗含了照料活动中家庭与政府的责任边界在动态调整（Daly & Lewis，2000）。

当然，对照料活动的经济支持也经常配合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等政策执行。以法国为例，“鼓励生育”构成了 1985 年法国“家长育儿补助”政策出台的最要目的。根据这一政策，如果父母在第三个孩子出生后提出辞职或者缩减工作时间，政府将为其提供固定的津贴直到最小的孩子年满 3 周岁。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阶段，该政策将通过鼓励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来降低失业率和政府失业救济金支出，成为促进就业和减少财政支出的措施。数据显示，领取家长育儿补助的群体中有 95％以上是失业和低收入的女性。1994 年，法国政府将“家庭育儿补助”政策向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开放，直接导致她们劳动参与率从 1994 年的 70％下降到 2004 年的 55％（Milner，2010）。

（三）照料公共政策的发展困局

为儿童、老人等群体提供照料公共产品已经成为一国福利生产与供给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角度看，照料公共政策内生于经济增长，也即照料公共政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尤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再分配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转型而产生的，这凸显了经济增长、国民财富增加是照料公共政策执行的前提（Ahn & Kim，2014）。但也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照料公共政策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制度运行刚性以及政策水平刚性的作用下，由照料公共政策所产生的财政压力正在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学界对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还是负面的阻碍作用尚无定论，但在全球经济低迷、增长乏力以及公共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缩减包括儿童补贴、社会服务支出以及进行福利体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并逐渐与“侍从式主义”“交易式民主”的政治活动形成博弈，照料公共政策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尽管多数学者如 Zhang & Zhang（2004）、Mani et al（2012）等指出，照料公共支出能够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因而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公共福利体系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持相悖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包括照料服务在内的公共福利支出会对居民储蓄和物质资本积累产生抑制作用，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Izák（2011）基于欧盟 25 个国家的经验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甚至有学者提出，包括照料公共服务与补贴、养老金支出、长期护理费用等在内的支出及其所形成的“福利陷阱”加剧或造成了一些欧洲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经济衰退”和“主权

债务危机”(Vis et al,2011)。而持中性态度的学者认为,照料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因项目类型、国别、规模以及是否具有生产性而不同(Afonso & Jalles,2014)。针对儿童的照料公共政策及财政投入显然具有生产性,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经济增长(Jenson & Saint-Martin,2006)。因而,通过更加细致的计量分析厘清福利支出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将有助于准确定位照料公共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市场与照料产业经济

市场介入照料服务供给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当个体或家庭的照料需求汇集成一定规模时,将会推动市场组织参与到照料服务的供给中并促成照料产业的形成。更加规范化、精细化、个性化的照料服务将会以商品的形式供给出来以满足不同主体多样化的照料需求。但在照料服务商品化以及照料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经济结构转型、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形势以及政府引导扶持等利好因素,也在“定价机制”“成本控制”“质量监督”等方面存在着制约照料产业发展壮大的因素。

(一)照料服务产业化的可能性

在照料服务实现社会化、专业化的供给过程中,市场主体的介入时间要晚于政府主体,这是因为政府往往肩负着提供基础的、低水平的以及弱势群体最需要的照料服务责任(Molina,2015)。此时,无论是需求端——消费主体对市场照料服务的需求表达,还是供给端——照料服务生产商与照料劳动力的照料服务供给能力,都处于低水平阶段,甚至还未形成一种稳定的产业形态。而在照料服务发展不断扩张时,具有逐利动机、创新意识以及信息优势的市场主体,在提供与满足公众不断趋于个性化、精细化的照料服务需求上更具有优势。照料服务得以走向产业化既取决于微观家庭部门照料生产能力的下降,又得益于宏观层面经济结构转型、政府对照料服务行业的引导等。

微观上,如前文所述,传统的照料服务通常是由家庭部门的女性无偿提供,而伴随着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以及在经济社会事务中重要性的提升,家庭部门的照料服务生产能力开始下降(Thévenon,2011)。尤其是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男女性任何一方放弃工作而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照料中的成本都是巨大的,照料开始从私域走向公共视野,呈现出“去家庭化”的趋势。当然,如 Feinberg et al(2011)所言,家庭所“卸去”的照料责任无论是由政府还是市场承担,都需要以付费或公民资格的形式从第三方获得,在事实上承认了照料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这也为照料服务成为商品而进入市场领域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宏观上,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与要素转换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增长动力由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纷纷向具有更高回报率的服务产业流动,加上政府在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形势下对照料服务行业的政策支持,照料服务产业有了更加充足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据 Dexter & Li(2012)估计,2010 年英国照料护理服务市场的价值达到 140 亿欧元,其中,市场部门的服务总额为 99 亿欧元(占 71%),政府部门服务总额为 22 亿欧元(占 16%),志愿部门服务总额为 19 亿欧元(占 13%)。

(二)照料服务产业化的局限性

首先,在成本控制方面。Himmelweit(2005)指出,照料活动不太可能像其他活动一样在标准化、普遍化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供给和规模经济,通过增加人均照顾人数来提高照料服务生产效率的做法往往会导致照顾质量的下降。照料服务质量的保证也需要持续的时间投入,不太可能借助机器、设备等外力来实现。由于照料服务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而生产效率提升速度低于其他部门,导致照料经济的发展更容易受到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①的制约,照料服务生产厂商和消费者都将为此付出更高的成本。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成本病”会导致照

①鲍莫尔“成本病”是指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不断上升的现象。其源于鲍莫尔(Baumol,1967)所构建的一个包含停滞部门(服务业)和进步部门(制造业)的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在该模型中,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将部分抵消工资上涨,但停滞部门由于生产率保持不变,导致进步部门每次技术进步都会推动停滞部门成本上升。

料服务业被迫做出降低服务质量或压低工资水平的非理性决策。

其次,在定价机制方面。照料服务定价困难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方面解释。从供给方的角度看,受到其他行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影响,为弥补生产成本和维持必要利润而适时提高照料服务的价格是必然的,但这势必会影响照料服务的市场销售情况。并且,由于只能用量化的产出衡量照料的经济价值,照料从业者通常无法获得与其所付出精力、时间、素质相匹配的薪酬(Budig & Misra,2011)。从需求者的角度讲,由于缺乏相应的甄别和信号机制,护工、家政人员等所能够提供的照料服务质量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识别,从而照料需求者难以评估照料价格的合理性(Mason & Kuhlthau,1989)。

最后,在质量控制方面。诚如 Daly & Lewis(2000)指出的那样,基于金钱所确立的雇佣关系可能会导致照料过程中"情感"投入的减少,照料不仅仅是对被照料者提供照料服务的过程,还包含了与被照料者建立关爱、包容、信任等情感联系和道德约束,是一个"爱、思考和行动"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照料提供者和被照料者有不同的利益考量,被照料者所得到的照料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照料提供者的"自我激励"和"情感投入"。因而,没有情感投入的照料是机械化、低质量和去个性的,但现实中对关爱、温情、信任等的监督和控制似乎无法全部做到。并且,被照料者(如儿童、失能老人)往往不具有完整的消费主权,被照料过程中受到侵害、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照料服务产业的劳动力状况

1. *照料从业者的特殊性及高流转率*。不同于实物形态的商品生产可借助技术、设备以及标准化的流程来完成,照料服务的提供完全依赖于照料从业者持续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且具有较强的特殊性、灵活性。诚如 Folbre & Nelson(2000)所言,需要照顾的群体往往在生理、智力、行动等方面具有不完整性,这就决定了照料从业者的工作时间长、强度高和弹性大的工作特性。比如,照料幼儿的家政人员往往需要居住在雇主家中并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由于儿童的照料需求没有 8 小时工时以及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明显界限,照料从业者完全处于工作状态以及潜在的工作状态,从而适用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确定标准不适用于照料服务行业。这一内生于照料服务本身的矛盾往往会引起照料从业者工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频繁流动。而照料从业者的频繁流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一方面,要求其自身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不同照料需求者的需求和特性;另一方面,将导致其社会保障权益受损,甚至在就业与失业的间隙中失去《劳动法》的保护。当然,照料劳动者高频率的流动对照料购买者而言也是不利的,这意味着要重新与其建立起信任和情感联系(Randall & Williams,2006)。

2. *照料技能培训与行业标准*。与其他产业一样,资本进入照料服务行业也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受到鲍莫尔"成本病"的根本性制约,照料服务供应商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提升利润空间的做法似乎行不通。因为在单个照料从业者生产效率稳定的约束下,照料服务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照料服务质量的下降。Penn(2011)指出,照料行业也存在着劳动者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压低工资水平以提升获利空间存在着"最低工资水平"的刚性约束。于是,通过减少员工培训投入尽可能节约成本,成为诸多照料服务供应商提升照料生产利润空间的选择,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照料劳动者流动频繁的回应。照料服务供应商往往希望其所雇用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抑或是能够为自己的技能培训买单,但理性的工人在没有获得高工资回报的情况下,宁可不参加技能培训也不愿意为自己的培训买单,这直接影响和限制了照料服务行业质量水平的提升(Klaver et al,2013)。鉴于此种情况,欧洲一些国家出台了诸如专业人才认证体系、资格准入以及行业标准等措施,以确保照料服务的质量。

3. *照料劳动者市场发展规划和预期*。诚如欧盟社会保障委员会 2011 年向成员国所提出的倡议:"拥有一个可以提供健康和社会照料的、有效运转和高质量的系统,对欧盟社会和经济而言至关重要。"通过开放合作的方式促进各国的照料框架衔接,提高健康照料和长期照料的有效性、可持续性和响应能力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健康和照料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可视为缓

解欧盟经济增速下行背景下的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European Commission,2011)。沿着这一目标,欧盟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并在解决照料和健康行业劳动者短缺方面做了重点部署,包括"推动和促进欧盟内部劳动者流动""通过正规的雇员培训、激励机制和工作条件来保证充足的人力资源""构建照料行业技能联盟"等,以化解未来欧盟照料劳动者短缺的危机。据预测,2010—2020 年整个欧盟将产生近 800 万个健康照料工作岗位,而到 2020 年由劳动者供求不匹配所导致的健康照料服务人员缺口将达到 200 万。照料劳动者短缺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European Commission,2012)。

四、总结和启示

纵观发达国家照料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有就业模式转型、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等经济因素的推动,又有家庭功能结构变迁、性别平等、少子老龄化等社会因素的牵引。在当前服务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引擎的背景下,作为服务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照料经济,在化解老龄化危机、儿童照料赤字以及"工作—家庭失衡"等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为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经验和思路。本文尝试对照料经济学研究的演变和最新进展加以梳理,关注照料活动衍生的主要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在公共经济、产业经济等的前沿进展,并尝试总结已有研究中的演进逻辑与发展困局。

从研究方法看,照料经济学逐渐向应用性的实证研究发展。现阶段,基于规模宏大的专业性、针对性的调查数据,如 OECD 国家家庭数据库(OECD Family Database)、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情况调查(SHARE,Survey of Health,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时间利用调查数据(TUS,Time Use Survey)等从实证角度开展的研究占据多数。从研究主体和范围上看,照料经济学主要围绕照料服务提供者、政府和照料市场组织三个主体开展,呈现出与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时间经济学以及女性经济学研究相融合的趋势。

从研究进路上看,首先,照料经济起源于对家庭(女性)无酬照料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认可,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以量化确认,这为照料服务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供给奠定了基础。其次,基于大样本的家庭或个体照料决策形成机理的微观分析,为政府介入照料公共服务供给和照料公共政策优化提供了参考依据。再次,通过将照料公共政策的内容和具体政策工具嵌入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福利体制内,形成了对照料公共支出与财政安全、经济发展关系的客观审视。最后,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照料在实现商品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供给过程中的可行性和局限性,以及在"定价机制""成本控制""质量监督"和"劳动力供给"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厘清了照料经济发展中的利弊因素。

从研究结论与发展困局上看,首先,受限于工业化及其所衍生出的工业资本主义逻辑,家庭照料活动逐渐演变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作为其经济价值的重要回应,照料活动影响着家庭原有的经济决策与互动。然而,由于照料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性别化分工、情感投入、支付意愿难以测量等),其经济价值难以计算。其次,照料活动的稀缺性、人力资本投资、正外部性(潜在的)等属性成为政府介入照料活动的理论基础,然而理论界对照料责任政府化的效果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的本质在于社会福利性质的照料活动是否抑制经济发展,进而引发了缩减社会照料服务开支与"侍从式主义""交易式民主"等政治活动的博弈。最后,照料行业所客观存在的生产效率低、质控措施缺失、劳动者高流转率以及鲍莫尔"成本病"等,成为照料产业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在当前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优化生育配套措施、完善家庭功能的社会政策背景下,推动照料经济在我国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内涵和社会内涵。以往的研究和各国照料经济发展历程为我国照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包括:(1)推动家庭无酬照料价值认可,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在借鉴国外无酬照料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开发适用于我国国情的无酬照料经济测量方法,推动无酬照料的经济价值在微观与宏观层面的确认。(2)政府应积极介入照料公共服务供给,切实

分担与降低家庭照料成本。通过提供带薪照料假期、照料公共设施与服务以及照料家庭补贴等多样化和灵活的政策措施,既可以分担家庭照料成本,又能扩展家庭购买市场照料服务的可行能力。在此过程中,应明确用人单位的责任并推动形成企业制度安排,严格约束其将上述措施落到实处。(3)坚持市场主体在照料服务经济繁荣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完善市场准入、法律监管、秩序规范以及产业优惠措施,为照料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完备的基础规则和政策环境。(4)协调照料服务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政策完善等的关系。通过更加精细化的设计,使照料经济发展在有效回应社会民生需求的同时,为服务产业的增长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提升贡献新动力。

参考文献:

吉布森·格雷汉姆[1996]2002:《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加里·贝克尔[1991]2005:《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

理安·艾斯勒[2007]2008:《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高钰、汐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assve, A. et al(2014), "Desperate housework: Relative resources, time availability,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gender ideology across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8):1000-1022.

Addabbo, T. et al(2010), "Gender budgets: A capability approach",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11(4):479-501.

Afonso, A. & J. T. Jalles(2014), "Fiscal composition and long-term growth", *Applied Economics* 46(3):349-358.

Aguiar, M. & E. Hurst(2007), "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 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3):969-1006.

Ahn, S. H. & S. W. Kim(2014), "Social investment, social service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welfare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4(2):109-119.

Apps, P. & R. Rees(1997), "Collective labor supply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1):178-190.

Arno, P. S. et al(1999), "The economic value of informal caregiving", *Health Affairs* 18(2):182-188.

Barber, C. E. (2013), "Viewing the 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 support program through the family impact lens", *Family Science Review* 18(1):84-106.

Baumol, W. J.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3):415-426.

Baxter, J. & B. Hewitt(2013), "Negotiating domestic labor: Women's earnings and housework time in Australia", *Feminist Economics* 19(1):29-53.

Becker, G.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75(299):493-517.

Bertrand, M. et al(2015), "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2):571-614.

Bettio, F. & J. Plantenga(2004), "Comparing care regimes in Europe", *Feminist Economics* 10(1):85-113.

Bolin, K. et al(2007), "Informal and formal care among single-living elderly in Europe", *Health Economics* 17(3):393-409.

Brouwer, W. B. et al(2005), "Process utility from providing informal care: The benefit of caring", *Health Policy* 74(1):85-99.

Browning, M. et al(1994), "Income and outcome: A structural model of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6):1067-1096.

Budlender, D. (2008), "The statistical evidence on care and non-care work six countries", UNRISD Programme Papers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No. 4.

Budig, M. J. & J. Misra(2011), "How care-work employment shapes earning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9(4):441-460.

Burda, M. et al(2013), "Total work and gender: Facts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6(1):239-261.

Canada Revenue Agency(2018), "Child and family benefits",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

child-family-benefits. html.

Carmichael, F. & S. Charles(2003),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informal care: Does gender matter?",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2(5):781－803.

Daly, M. & J. Lewis(2000),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re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welfare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2):281－298.

Dexter, W. & B. Li(2012), "UK social services: The mutation of privatization", https://www. european-services-strategy. org. uk/wp-content/uploads/2012/09/uk－social－services－mutation－of－privatisation. pdf.

Dong, X. Y. (2015), "Gender patterns and value of unpaid care work: Findings from China's first large-scale time use surve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1(3):540－560.

Dwyer, R. E. (2013), "The care economy? Gende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job polarization in the U. S.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3):390－416.

European Commission(2011),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the Europe 2020 strategy: A report of the 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ission(2012),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on an action plan for the EU health workforce", SWD(2012)93, Strasbourg.

Fahlén, S. (2016), "Equality at home—A question of career? Housework, norms, and policies in a Europe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mographic Research* 35:1411－1439.

Feinberg, L. et al(2011), "Valuing the invaluable 2011 update: The growing contributions and costs of family caregiving", Washington, DC: AARP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Folbre, N. (1994),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86－90.

Folbre, N. & J. Nelson(2000), "For love or money-or bo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4):123－140.

Folbre, N. & S. Himmelweit(2010), "Introduction children and family policy: A feminist issue", *Feminist Economics* 6(1):1－3.

Galor, O. & D. N. Weil(1996), "The gender gap, ferti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3):374－387.

Gash, V. (2009), "Sacrificing their careers for their families? An analysis of the penalty to motherhood in Europ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3(3):569－586.

Guest, R. & N. Parr(2013), "Family policy and couples' labour suppl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6(4):1631－1660.

Gustavsson, A. et al(2010), "Willingness-to-pay for reductions in care need: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informal care in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5(6):622－632.

Heckman, J. J. & P. Carneiro(2003), "Human capit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9495.

Himmelweit, S. (2005), "Can we afford (not) to care: Prospects and polic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Gender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15.

HM Revenue & Customs(2015), "Child benefit rates", https://www. gov. uk/child-benefit-rates.

Hu, Y. (2018), "Patriarchal hierarchy? Gender, children's housework time,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post-reform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0(3):310－338.

Izák, V. (2011), "The welfare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Prague Economic Papers* (4):291－308.

Jenson, J. & D. Saint-Martin(2006), "Building blocks for a new social architecture: The LEGO paradigm of an active society", *Policy & Politics* 34(2):429－451.

Kabeer, N. (2001), "Family bargaining", in: N. J. Smelser & P. B. Baltes(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Press.

Kimmel, J. & R. Connelly(2007), "Mother's time choices: Caregiving, leisure, home production, and paid work",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2(3):643－681.

Klaver, P . et al(2013),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home-care services",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Kögel, T. (2004), "Di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within OECD countries really change its sig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7(1):45－65.

Lefebvre, P. & P. Merrigan(2008), "Child-care policy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mothers with young children: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Canad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6(3):519－548.

Lewis, J. (2001), "The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 Implications for work and care", *Social Policies* 8(2):152—169.

Lewis, J. et al(2008), "Pattern of paid and unpaid work in western Europe: Gender, com-modification, preference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8(1):21—37.

Liu, X. T. et al(2017),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informal care for disabled elderly pers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HARLS",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5(4):1364—1374.

Lundqvist, Å. & C. Roman(2008),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family policy, 1930—2000",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33(2):216—236.

Lutz, W. (2006), "Fertility rates and future population trends: Will Europe's birth rate recover or continue to dec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drology* 29(1):25—33.

Mani, S. et al(2012), "Long-term impact of investments in early schooling: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9(2):292—299.

Manser, M. & M. Brown(1980), "Marriag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 bargaining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view* 21(1):14—54.

Mason, K. O. & K. Kuhlthau(1989), "Determinants of child care ideals among mothers of preschool-age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3):593—603.

Milner, S. (2010), "'Choice' and 'flexibility' in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Towards a convergence in policy discourse on work and family in France and the UK?", *Policy and Politics* 38(1):3—21.

Molina, J. A. (2015), "Caring within the family: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6(1):1—4.

Moss, P. & F. Deven(2006), "Leave policies and research: A cross-national overview",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39(4):255—285.

OECD(2014), "Balancing paid work, unpaid work and leisure", http://www.oecd.org/gender/data/balancingpaidworkunpaidworkandleisure.htm.

OECD(2016), "OECD family database: Public policie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http://www.oecd.org/els/soc/PF1_2_Public_expenditure_education.pdf.

Patel, A. et al(2004),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stroke care: Cost-effectiveness and cost-utility analyses from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troke* 35(1):196—203.

Penn, H. (2011), "Gambling on the market: The role of for-profit provis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9(2):150—161.

Perozek, M. G. (1998),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trategic bequest mo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2):423—444.

Pezzin, L. E. et al(2009), "Long-term care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Do children increase care-giving by spous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328.

Posnett, J. & S. Jan(1996), "Indirect cost in economic evaluation: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unpaid inputs", *Health Economics* 5(1):13—23.

Randall, G. E. & A. P. Williams(2006), "Exploring limits to market-based reform: Managed competition and rehabilitation home care services in Ontario",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7):1594—1604.

Saraceno, C. (2011), "Childcare needs and childcare policies: A multidimensional issue", *Current Sociology* 59(1):78—96.

Sousa-Poza, A. et al(2001), "The allocation and value of time assigned to housework and childcare: An analysis for Switzerland",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4(4):599—618.

Steurer, M. (2009), "Children as family public goods: Some implications for fertility", School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4.

Sullivan, O. et al(2018), "Stalled or uneven gender revolution? A long-term process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why change is slow",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263—279.

Thévenon, O. (2011),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37(1):57—87.

Van Den Berg, B. et al(2005), "Economic valuation of informal care: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applied to informal caregiving", *Health Economics* 14(2):169—183.

Van Den Berg, B. et al(2006), "Economic valuation of informal care: Lesson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pportunity costs and proxy good method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4):835-845.

Van Houtven, C. H. & E. C. Norton(2004), "Informal care and health care use of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3(6):1159-1180.

Vere, J. R. (2001), "Social security and elderly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Labor Economics* 18(5):676-686.

Vernooij-Dassen, M. et al(1996), "Predictors of sense of competence in caregivers of demented perso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3(1):41-49.

Vis, B. et al(2011), "To what extent di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tensify the pressure to reform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5(4):338-353.

Wakabayashi, C. & K. M. Donato(2005), "The consequences of care-giving: Effects on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4(5):467-488.

WHO(2015),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 http://www. who. int/ageing/publications/world-report-2015/en/.

World Economic Forum(2017),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http://club. kdnet. net.

Zhang, J. & J. S. Zhang(2004), "How does social securit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7(3):473-500.

Research Progress on Care Economics

LIU Erpeng ZHANG Qilin HAN Tiankuo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Abstract: Family care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scarce resource. The purpose of care economics is to explain how to use scarce resource to meet diversified care needs and how to create, choose and distribute new care resources. Care economics has also begun to be developed around three providers: care providers, government and market organizations, and evolved into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of care, the public economics of care and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re. The messages delivered by the evolution of care economics is that care activities have important economic value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of care is a dynamic process full of heterogeneity;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care activities obviously has positive externalitie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potential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investment; along with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flow of factors, it is possible to industrialize the care economy.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are economics abroad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problems such as pricing difficulties, poor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and Baumol's cost disease, it can still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re economy.

Keywords: Care Economics; Economic Value of Care; Public Policy on Care; Care Industry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刘洪愧)